

风物 深度

纪录片工作者陈巧真：拍下一个人在捍卫的，仅余的方寸及尊严

“或许我也会死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最好。”



香港纪录片工作者陈巧真。摄：林振东/端传媒

特约撰稿人 卢燕珊 发自香港 | 2021-12-15

无家者 摄影节 纪录片

“我自小被父母卖给别人，没兄弟姊妹没亲朋戚友，一直都是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孤孤独独。”

11月香港国际摄影节策划陈巧真纪录片《寻找刘铁民》和《一板间》街坊放映活动，游荡街头半世纪的刘铁民如是自我介绍。“一世人，好像废人一个，但我都有东西想争取。希望在社会上，有所作为。”他笑说在手机打“刘铁民”，就会看到很多片段。“我想大家一起建立好的社会，成为进步的人。未来世界，平等自由。”

另一场摄影节策划的“与前无家者刘铁民同行深水埗”，陈巧真陪伴带路人，重访那些不再属于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间，最后抵达《一板间》现场——长沙湾板间房，从追悼“四处为家”精神到高压板房独存，阿真一路走来的影像纪录，原来都是对何谓“家”的残忍反问。



香港国际摄影节策划的“与前无家者刘铁民同行深水埗”，陈巧真与前无家者刘铁民带路重访那些不再属于香港市民的公共空间。图片来源：香港国际摄影节提供

“我说，我们的诉求不是藐视法庭，我们的诉求是正义。时间很宝贵，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刘铁民：自由人，四屏幕社会

先从刘铁民对这个“家”的无为或作为说起。上网一搜果然看见很多报导：“涂鸦‘奠’字悼示威者刘铁民判囚两周”、“社运常客刘铁民流浪半世纪后与爱猫上公屋”、“涉太子站外墙写‘沉冤待雪’七旬汉认忘记上庭被充公保释金”、“流浪汉刘铁民眼中的香港正在变成地狱”、“占旺藐视法庭案最年长被告，七旬刘铁民囚四月”……

在《寻找刘铁民》中，社运老将曾健成谈及三十年前新华社门外已认识的铁民叔“我行我素”；警方上庭传票地址形容为“居无定所”；主角当年涂鸦自白“四海为家”、“一无所有”。从法院出来，刘铁民对著阿真镜头：“我说，我们的诉求不是藐视法庭，我们的诉求是正义。时间很宝贵，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在今次摄影节版本之前，2019年6至7月广州番禺区新造当代艺术中心“一个人的社会”展览中，“刘铁民 X 陈巧真”版以四个萤幕呈现四种视角。阿真告诉我，“第一个，是媒体或新闻信息捕捉到的刘铁民，属公共层面；第二个是我拍的私人纪录，日常生活的刘铁民；第三个是警察拍的，好长，数十小时，每个镜头都有刘铁民但要细心找；第四个是我和刘铁民一起构思的剧情或实验影像，跟现实有一段距离。”

原来，有两个警察用了一年时间寻找刘铁民，要将那四十只DVD——警方在伞运期间拍摄共38小时的“呈堂证供”以及上庭信交给他。至于阿真的“寻找”，原本是找他合作构思剧本，为鲜浪潮拍部剧情片，结果开拍两三场戏后，主角消失了。





摄影作品《桥下的人》中的刘铁民。图片来源：陈巧真提供

“或许我也会死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最好。”

阿真跟刘铁民的结识始于2012、2013年，仍是城大学生的她拍摄一辑黑白照片《桥下的人》在摄影节“300家”中展出。阿真忆述拍摄桥底露宿的人，“那时社区仍然好开放，好容易就能跟人聊天，不像后来大家都用木板把自己围起来。”其后林国璋牧师发起“桥底志”计划—邀请“采风同学会”八位年轻导演拍摄深水埗桥底人情冷暖，其中包括郑蔼如《苦路》、徐智彦《韦成奇》、尹景辉《关于桥底二三事》等，《浊水漂流》导演李骏硕提到《韦成奇》正是谢君豪饰演的越南老爷原型。之后阿真和男友阿彦共同拍摄《叫我陈太》、《无调人间》，从此并肩作战，齐上齐落。

实验短片《无调人间》有一场戏，关于刘铁民对母亲的情感或虚想记忆，这个“家（人）”遗留的创伤，跟十二岁来港前在不同亲友家庭“寄宿”流徙的阿真连结起来—那是她对“有家／无家／非家”情结源头，没有家人的“屋企（家）”还算家吗？《寻找刘铁民》由潦草“万事起头难 / 17岁露宿榕树头 / 惊惶万分”作开场白，然后在主角消失前有一幕拍摄他上山葬第六只猫：“猫有灵魂，葬在一起，死后可相见。”

“或许我也会死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最好。”阿真把他的话，逐字大力地打在画面上。半世纪四处为家，某程度上是个人选择，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可是，自从这座城市不再属于她的市民，公共空间已不容许我们做原本可以做的事，连那些原本没人在意的“little space”罅隙也要赶尽杀绝时，刘铁民也只能被安排“上楼”搬进公屋，好“安抚”社工不用再劳烦人家？阿真说，其实他很不习惯，入住公屋两星期，又返回上水公园，四处走来走去。“社工视角，在刘铁民身上不适用。由十七岁到现在，他建立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建立了自己一套哲学。”





纪录片《寻找刘铁民》剧照。图片来源：陈巧真提供

“那么窄的空间，原本就没什么角度，但他们让摄影机放在床边甚至床上，腾出来的，都是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空间。机位不同，反映持机者和里面人的转变关系。”

板房：异世界，孤绝精神

阿真对板房的好奇，亦由认识了桥底朋友开始。从他们口中听闻板房如何恶劣，即使综援有板房最低1800元租金津贴，大家宁愿搬回桥底。曾居劊房的阿真觉得，有独立厕所的劊房已算舒服，板房“有种好‘罨’（憋闷）气息，令人抑郁发脾气。”她睁大眼睛问我，“你知道虱的血迹是怎样？”

“在墙隙用手指搾死牠，就会留下长长血迹。我们曾经去过一间板房，四面墙都是虱和虱的血迹，那个人身上也是。”住客不大能看见，食厕（吃饭排泄）都在床上。正是那刻震撼，令她想做长长的纪录，不只是拍几辑有“视觉冲击”的照片，因为那些最终沦为贫穷或土地议题，看不见人。

“哗，竟然有人这样生活，他们究竟怎样面对这样的状态？”目击虱的血证，发生在阿真、阿彦参加“无家者协会”义工计划，一年之间探访过很多不同地区的板房大厦。一年多以后他俩离开义工队，开始熟络的板房住客反而更自在地打开自己。2018年开始在板房内外架起摄录机，阿真心知头半年片段用不著，因大家会感觉到有个不属于那空间的东西存在。直至习惯半年，感觉较自在，2019年初进入拍摄状态，至今仍在进行。

摄影节放映2019年剪辑的阶段版本暂名《一板间》，原本叫《热室》。66分钟超乎观众想像，镜头在墙角或走廊尽头，安静记录超现实平行时空之日常：大雄在贴满花花绿绿图像房内看似自在画画、普通话孙先生在走廊练功、劊蟹（宰杀螃蟹）婆婆时不时笑著爆几句粗口、混血双非女孩在后楼梯墙上快乐绘画大海。

如此压缩空间镜头很难抽离？拍摄行为如何介入板房日常？“从一开始答应拍摄，接纳那部摄影机时，某程度是他们对我这位外来者的包容。那么窄的空间，原本就没什么角度，但他们让摄影机放在床边甚至床上，腾出来的，都是他们愿意跟我分享的空间。机位不同，反映持机者和里面人的转变关系。”

摄录机总是待在角落一直开着，起初，阿真试图隐身，后来发觉很难亦没必要。当声音介入，对话打开，事情原来跟想像不一样。有次孙先生看到自杀新闻，就骂年轻人“抵死（活该）”，她忍不住反驳，才知他其实在说自己。“因为他也想过自杀，觉得生活好痛苦，只能逼自己去理解这痛苦，一个人承受，这就是人生的意义。年轻人没有希望，他其实是同情的。”在后来尚未剪辑的拍摄中，阿真已不再介意成为别人“日常”一部份。



纪录片《一板间》剧照。图片来源：陈巧真提供

“他们如何在香港当前环境，在十多平方尺空间内，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许那个世界，确有其自由在里面……这是我最想讲的其中一种精神——不同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信念去对付这个残酷世界。”

以为纪录别人，原来照见自己。“究竟我对观众有多诚实？讲故事的背后动机是否完全纯良？其实我有ego也有虚荣部份。”由当初带著点猎奇心态参加义工队观看“异世界”，到今日仍尝试比较平等地进入他们的故

事，阿真问，故事的核心是什么？“就是他们如何在香港当前环境，在十多平方尺空间内，创造自己的世界。或许那个世界，确有其自由在里面，这对我来说最重要——一个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得找一个所谓‘壳’或者属于自己的空间去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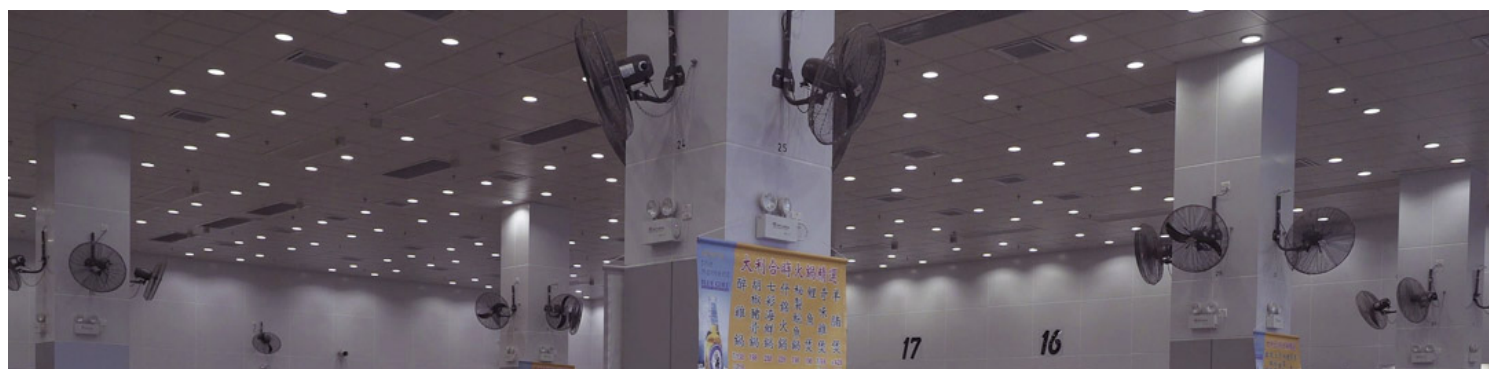
“譬如抑郁症的大雄，要用颜色填满整个房间，填满走廊属于他的范围，把自己的部份用到最尽。他们可能没什么家人朋友，处于长期孤独中，但仍花那么多心力去绘画，因为这是支撑整个生命非常紧要的部份。这是我最想讲的其中一种精神——不同人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或信念去对付这个残酷世界。”

家：监狱、创伤与纪录波澜

一无所有，只剩bare life。自在方尺，也是囚牢。家定监狱，能否取决于个人意志？“看似自在自足的背后是什么？一个没法撼动的坚实世界，凭个人之力，没法动摇，没法改变其一丝一毫。惟独在监狱里面，你能否找到方寸空间可以捍卫尊严？捍卫属于自己的领土？”对阿真来说，无论是自小的寄宿家庭，抑或回到父母家，以至一个人搬出来，都是监狱。逃离监狱的方法就是创作，“这是我找到可以自由表达的方寸之土。”

从《桥下的人》、《32+4》到《寻找刘铁民》、《一板间》，有家无家非家，似乎是永恒主题，可放诸四海处境，以梳理底藏创伤？阿真告诉我正准备做游击展“Lost in Sand”，关于“我老豆嘅屋企（我爸爸的家）”——汕尾梧桐村。两三年前陪老父回乡，拍了录像和照片，这两年因运动和疫情没法回去，没想到大改造工程，整条村落就不见了。“想讲老豆失去家的状态。啊，原来屋企可以咁容易就有咗（想讲爸爸失去家的状态。啊，原来家可以这么容易就没了。”老豆的如是，香港地亦然。“一些好熟悉的，眨眼间，正在失去。”此刻，她正赶紧拍摄一个关于香港的片，现在不拍就没时间拍的题材。

对阿真来说，无论是自小的寄宿家庭，抑或回到父母家，以至一个人搬出来，都是监狱。逃离监狱的方法就是创作，“这是我找到可以自由表达的方寸之土。”





纪录片《无调人间》剧照。图片来源：陈巧真提供

至于透过创作梳理创伤？“那不是可以看见的，是好漫长的事，一个旅程，一个process。”与阿真其他纪录有别，有点Roy Andersson的《无调人间》，就是尝试梳理后伞运抑郁。原本她找来身边十个有类似状况的朋友，拍无故事性只有点点情绪的场景。拍了一个便拍不下去，“《无调人间》是一个想做纪录片的失败变奏版”。

开场第一个镜头，由采风同学李伟盛出镜，六位共租工作室的成员，不时在友人的创作中担当幕前幕后不同岗位，成为鲜浪潮或南方影展等常客，确实有点“后新浪潮”。青年导演阿真亦成长为评审，在刚结束的平地学生电影节中推介没入选的“沧海未遗”，包括台湾艺术大学香港毕业生罗乐文的《夏雪将至》。“未能入围不一定是作品不够好，当中对影像美学的探索、试验已是价值所在。在这个高压年代，剧情和纪录片的创作空间愈加紧迫，如何能另辟窄道，寻找新的电影观念和方法，是我们共同的课题。”

自2013采风“纪录片大师班训练营”之后，有张伟雄“三个迷上纪录片的女生”、已逝世的张铁梁发起“香港真实影像协会”、自主映室、映画手民、碧波押……还有要铭记的学联“自治八楼”社会运动电影节和影意志香港独立电影节……香港纪录影像实验可谓够“波澜壮阔”。对于一浪接一浪的汹涌，阿真归因于多了想表达的欲望和观众的不满足，更多人希望述说身边所发生。

“相对于剧情片，纪录片比较自由和简单，一个人也可以好raw地拍。这很重要，尤其运动之后多了人做纪录片，因为太多人需要梳理情绪和讲一些事情，包括学生。”有工作室成员不时问：做完一部片只能在国外放映，对香港人有什么意义呢？阿真相信，东南亚地方的经验可有参考价值。

“泰国也是个很高压的地方，但他们的创作，哦，原来影像可以这样处理，同样好有共鸣。这些正是我们现在要学习的。有人会觉得，这种方式或观念，只是擦边球；想光明正大，就预了（预计了）不能在香港放映。其实是每个人的位置 and 选择，2019经历了那么多，明白兄弟爬山是什么一回事，那就各自做自己应该做的。”

